

中国古典美学视域下的体育文化探源与概念思辨

吕艾文

(上海体育大学武术学院,上海 200438)

摘要:体育文化的历史生成与概念思辨不仅是体育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更是探究中国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规律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为解决以往体育起源诸学说过于笼统和宽泛的不足,从体育的生成与发展中把握其本质特征,从而提出“礼乐起源”的学说,以期在体育的形式和形态中理解其文化智慧与审美理想,对体育进行一种文化与审美的整体观照。中国体育的历史传承深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熏陶,具有塑造行为、培养情感和提升品格等审美教化功能,并对近代以来中国“体育”术语概念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为摆脱多年来体育概念定义困难的尴尬局面,应坚持历史与逻辑发展相统一的原则,避免对体育概念进行统一划归式的总结,从中国体育的礼乐本质与当代意义出发,坚守其“生命本位”的核心价值与“雅俗共赏”的艺术精神,为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提升提供理论创新。

关键词:中国古典美学;礼乐文化;体育文化;体育概念

中图分类号:G 80-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413(2024)03-0001-07

Exploration of the Source and Conceptual Discussion of Sports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LÜ Aiwen

(School of Wush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generation and conceptual thinking of sports culture are not only the basic problems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s theory, but also the basic approaches and important means to explore the law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culture. The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rites and music” solves the deficiency of the previous theories of the origin of sports which are too general and broad, grasps its noumenon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understands its cultural wisdom and aesthetic ideal in the form and form of sports, and thus carries on a kind of overall cultural and aesthetic observation to it.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of Chinese sports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classical philosophy, which has the function of shaping behavior, cultivating emotion and improving character, and has exerte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sports” in modern China.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of the difficult definition of sports concept for many year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unification of history and logical development, avoid the unified classification of sports concept, starting from the ritual and music essence and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sports, adhere to its core value of “life standard” and the artistic spirit of “elegance and common appreciation”,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for the deepening and promotion of sports theory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s; rites and music culture; sports culture; sports concept

长期以来,体育学术界对于体育文化的起源以及体育概念等基础理论问题的探索与争鸣从未停止,而试图对体育本质和概念进行强制性规整和固定化理解的研究也总是昙花一现,难成定论。中国体育有着怎样的本质属性和文化品格?其在生成发展及交流

传播中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特征和现实意义?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如何把握体育的现状与未来命运?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就不能不涉及到对体育起源的追问以及对体育概念的历史性追溯。在中国,体育经历了漫长的孕育生成过程,它以中国传统世俗的、

收稿日期:2023-04-23

作者简介:吕艾文(1993—),女,天津人,上海体育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学。

大众的审美文化为根基,既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又表现出对道家境界的追求。故其不仅体现为一种文化历史的沉淀,更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价值观念的追求;不仅是一种身体活动、工具和符号,更是一种人生态度、思想和理念;不仅给予人们一种感官的享乐,更使人们在具体的体验中成就人性的完满。据此,本文以中国传统哲学和古典美学的相关理论为支撑,从体育的生成与发展中把握其本质特征和历史命脉,从体育的形式和形态中理解其文化智慧与审美理想,明确“体育从何而来”以及“体育是什么”的问题,并以人的存在及其价值为根本尺度,明确“体育应是什么”的问题,对其进行一种文化与审美的整体观照。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从概念史学的视角出发,探索体育概念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新时代特征,对体育的概念及价值进行合理、可行的哲学反思与确证,打破对体育概念的固定化理解,为当代体育理论的深化和提升提供理论创新。

1 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与古代体育文化的历史生成

作为体育基础理论和体育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体育的起源涉及到用何种“体育史观”去观察和解释体育这一重要的社会现象^[1],若不研究、不了解体育的起源,则很难准确地把握与认识体育的本质和规律^{[2]11}。关于体育的起源,目前流行的观点有四种:一是认为体育起源于人类的遗传本能和生命需求,“精力释放”和“原始游戏”是体育的早期表现形式;二是强调人类的体育行为同动物的嬉戏打闹、奔跑跳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故将生产劳动视为体育产生的唯一源泉^[1];三是将以巫乐文化为代表的用于通神、敬神、驱鬼、祛魅的原始歌舞形式以及其他身体活动作为体育发生的原动力;四是主张将体育的起源归结为劳动生产、宗教祭祀、军事活动、生理保健等若干因素长期互相作用的复合结果^[3]。尽管迄今为止,关于体育起源的假说还未能形成一种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观点,但我们应该意识到,体育起源是一个和人类其他活动相互杂糅且缓慢渐进的过程,故有关体育起源的研究,多是一种推测性研究^{[2]18}。作为一种与人类俱生的文化形态,体育的历史同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悠久^{[4]6},与其说体育起源于生命需求、生产劳动、宗教祭祀等,毋宁说是人类的遗传本能和生命需求、生产劳动和生存技能、军事活动和宗教祭祀等为

体育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原始时代的华夏先民基于对自然的依赖与模仿、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与崇拜、对部族繁衍生息的渴望以及对死者灵魂的朦胧幻觉等产生了原始巫术与宗教信仰。他们通过以“祭礼”为核心的图腾歌舞巫术,一方面团结、组织和巩固了原始群体,以唤起和统一团体的意识、意向和意志;另一方面又温习、记忆、熟悉和操练了实际的生产生活过程,起到了锻炼个体技艺和群体协作的功能^{[5]6}。这种作为原始文化的图腾歌舞和巫术礼仪,不仅包含了智力活动的萌芽,同时也是本能情感的抒发与宣泄,在培育、发展人的心理功能方面,比物质生产劳动更为重要和直接^{[5]10}。自公元前 2070 年始,中国经历了夏、商、西周三个奴隶制王朝,朝会以及与之相关的祭祀礼仪活动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这种带有明显敬神、重礼的文化心理的大型社会活动逐渐演变出射礼与乐舞两项颇具体育特色的活动内容。射礼是融合射艺、音乐、舞蹈、礼仪和仁义道德于一体^{[2]46}的礼射活动,它不仅是培养国子射箭知识和技能、且具备一定强身健身功效的军事必修课程,更是一种有着严格等级制度、注重礼乐之教相配合的道德体验和人生哲学;乐舞则是将朝会、誓师、庆典、宴会以及祭神问卜等场合的歌舞表演进行整理和规范,并借助礼乐形式使之与表现社会伦理的政治观念、典章仪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成为一种兼具体育和德育功能的教化手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以及“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作为礼乐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儒家延续了自西周以来官学要求学生必须掌握的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基本技能,并以此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射、御作为军事训练中的重要武艺内容,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传授有关射箭和驾驭马车的知识以外,还注重与礼、乐教化的配合,从而成为一种培养谦和、礼让、庄重的道德品质的重要方式。在这种内外兼修、文武兼备、知兵尚勇的社会风尚的影响下,不仅促进了骑马射箭、器械技击、拳勇练力、奔跑跳跃、划船牵钩等为适应战争环境而形成的各类军事武艺训练活动的普及,更使得诸如蹴鞠、投壶、棋类、角力、龙舟、赛马、秋千、飞鸢、斗鸡等具有娱乐身心、思维锻炼和礼仪教化功能的各类民间游艺休闲活动逐渐兴盛。

与此同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提出了“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6]以及“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7]159}的命题,强

调对人的情感塑造不应只局限于人际关系和道德领域,应舍弃和摆脱功利、社会、生死等人世间的一切欲望、利害和考量,以达到一种莫可阻挡的精神愉悦和心灵自由。此外,道家还认为过多的物质享受会危害人的身体和精神,进而提倡通过“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7]183}等自然之法进行身体锻炼,通过“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7]94}的“坐忘”“心斋”的方式使精神超然于物外,从而达到养生、保身、长寿之功效。道家的这种修身养生理论既是对儒家内外兼修思想的延伸,同时也消解了礼乐文化所造成的人性异化,是对“人和”“人乐”思想的补充和完善,从而达到“天和”“天乐”的逍遥之境。儒、道哲学思想的互补构筑了人性自由与道德自律有机统一的人生境界,使传统的礼乐文化由主体化走向生命化,真正铸造出一种生命境界和审美境界^[8]。可见,对中国体育起源的研究倘若能摆脱某种“非此即彼”的唯一性定论,通过寻求诸假说中的最大共性来进行立论,那么可以说,中国体育的起源与古代礼乐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因为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富有生命活力的人文精神,从而成为囊括体育在内的多种艺术的文化母体和精神源头。

2 儒家礼乐美学精神与中国传统体育的审美教化功能

《礼记·乐记》中指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9]431}。在儒家看来,人的本性如同璞玉一般粗糙甚至残缺,而乐可以表现天地之间的和谐,有了乐的协调就能使人们相互亲近,因此乐的根本价值在于契合人的对象化的心理体验^[10],从而满足人们审美愉悦的生命需求;礼则是用来表现天地人之间的秩序,有了礼的区别就能使人们相互敬重,因此礼的根本价值就在于摆脱人的自然朴野而生成文化人性,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11]。礼乐的和合能够规范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情操,通过一种既伦理化又审美化的教育使人的生命获得一种有别于其他动物的人文精神与审美情趣。作为礼乐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体育同样也具备了以下审美教化功能:

其一,塑造“内外兼备”的人物行为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2]85},儒家认为,真正的君子既要重视思想品德的修养,又要注意言行举止的风度。而礼乐教化的实质正是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化和模式化,礼的意味不是静态的身体展

示,而是以动态的身体体现出来的典型化生活范式^[13]。荀子说:“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避违、庸众而野”^[14],表明“礼”对个体身体形象的塑造可以给人以一种端庄、文雅的合宜之美。而这种整体形象的展现一方面靠的是人内在的德性精神,如孟子提出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5],便是将人的道德和修养作为身体美的根本,正所谓“有诸内者形诸外”^[16],当个体通过后天的学习修为使德性精神充盈于内时,它必显发于体貌形躯,因此,修心即是正形,“心”可以实现对“形”的渗透与塑造,甚至能够修复、弥补外在形体上的某些不足^[11]。而另一方面靠的则是强健的体魄,孔子认为,“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9]570},一个人如果不能敬护自己的身体,就是对父母不孝。孔子将这种血亲情感作为体育锻炼和养生保健的重要动机,从而将强健的体魄与高尚的德行、优雅的风范、渊博的学识一同构成培养君子儒士的人必备素养。清代学者颜元认为,“孔门司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气血,调人性情”^[17],礼乐的教化可以锻炼人的肌肉和骨骼,促进人的血液循环和呼吸机能,能够将身体的强健作为外在感性的显现,将人格的修养作为内在理性的凝聚,从而培养出一种文雅与庄严合度的身体形象和生命力量。

其二,培养“礼乐相辅”的人物情感美。儒家将“礼乐”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其原因就在于礼能规范人的行为,乐能丰富人的情感。以礼乐文化的主体内化为路径,既推进了人类对生命本体的理性认知,又推进了礼乐文化由外在规范向生命精神的审美转换^[8]。孔子将礼乐作为情感培养的手段,并将体育视为一种礼仪性的情感活动,从而达到对人的思想教育、情感安慰和心灵净化的作用^[18]。作为一种民族的审美娱乐文化活动,体育秉承了礼乐文化的精神血脉,表现出一种以世俗娱乐和以大众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在修身、养生、自娱的同时,也不忘满足观众的观赏和娱乐需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2]94},完善的人格修养是将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心灵愉悦,即在熟练掌握各种运动技能和事物规律的同时获得一种具有实践力量的人格塑造,进而养成一种艺术化的自由精神和人生境界^[19]。可见,“乐”的教育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体感官上的快乐,更是一种由道德理性向审美境界的升华,具有“从审美创造、情感陶冶等方面激活、调谐人际关系和人格的养成”^[20]的独特价值。而体育的功能正体

现了人类感性的审美需求,其在本质上更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民间的、大众的审美娱乐活动;各种身体活动的表现结合音乐、环境的整体氛围,使人处于一种自由和谐的“乐”的精神状态,最终达到人性的完满。福柯认为,“人只有在审美超越中,才能达到人所追求的最高自由,也只有在审美自由中,才能实现创造、逾越,满足审美愉悦和更新自身生命”^[21],体育所带来的这种审美超越,不仅使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获得了提升,更是“人乐乐”与“众乐乐”^{[15]27}的群体审美精神的最高体现。

其三,提升“德术并重”的人物品格美。中国古典美学历来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儒家往往将善作为美的最终目的,而道家则更强调由道德境界走向审美境界,二者皆是將审美同人的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这种以善为美的特点对我国传统体育活动审美特色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一方面体现在中庸的哲学尺度对人格塑造以及人生境界的影响上:正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2]42},礼乐教化并不主张各种过分强烈的个体情感的展现,它所强调的恰恰是符合现实身心和社会群体的和谐与统一,注重从内心建立和塑造这种具有普遍性的情感模式。中国古典美学的这一基本特征,在武艺类项目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它使原本的杀戮技艺变为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去邪扶正的教化手段,进而形成了一整套维护社会安定、减缓矛盾冲突的“武德”体系^[22]。其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以“浩然正气”作为人格理想以及对“阳刚之美”的无限追求上:“仁者必有勇”^{[12]203},儒家认为,“勇”不仅是仁德君子必须具备的品格,更有利于自身修养的提高和集体意识的培养,因此鼓励人们积极从事实用性体育,精忠报国,并使之成为一种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力量;同时,塑造出“充实而有光辉”^{[15]371}的理想身体形象,指引人们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5]149}的主体人格靠拢,最终形成顽强拼搏、永不言弃、坚持不懈和自强不息的民族体育精神。

3 “生命本位”的古典美学观念与近代中国体育概念的重新确认

早在原始社会,华夏先民们通过表现生活场景和实现与神沟通的歌舞形式宣泄着生命的情绪、表达着生命的期待,并由此发展为和谐的节奏韵律,成为某种生命意识的象征,以此标志着华夏审美观念的萌

生^[8]。尽管在三代时期,这种生命意识逐渐成熟,使生命的本质由自然的感性化转向社会的规范化,并最终积淀成为重塑主体人格的礼乐文化,但基于生殖崇拜思维下的丰产理想,仍然一以贯之地保留了一种“以硕大为美”和以“力”为特征的身体审美观,如《诗经》中所称赞的美男美女,莫不是“硕人俣俣,公庭万舞”“辰彼硕女,令德来教”的勇武有力、形体健硕之形象。此外,在礼乐文化下的生命展现落实到身体形象塑造的同时,也关注到了人在气血、容貌、举止以及日常的饮食、服饰、起居等诸多方面,如荀子认为,“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慢;饮食、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14],揭示了礼乐教化同生命保养以及身体形象的内在联系。故尽管汉语的“体育”一词最早由西方的教育学说发展而来,但在引入国内学术话语圈的初期,体育的概念并未完全纳入到教育学的范畴,而是首先强调了“尚力”和“卫生”这两大基本理念,究其根本,这与中国古典美学“生命本位”的价值观念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中国近代“尚力”“卫生”思潮的掀起,发轫于严复对近代中国“民力已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23]现状的反思,呼吁国人发扬“竞争-进步”的精神以破除尚文、轻武、重德、反力的柔性传统^[24]。严复在接触西方体育之初便将斯宾塞《教育论》中的“身体的教育”译为“鼓民力”,有发达国民之手足体力、激发国民之进取精神之意,希望以此摆脱由于封建政教礼俗所导致的种族衰弱的局面。其主要原因在于,国人体质的羸弱并非指体能上的不足,而是由于吸食鸦片、女子缠足、饮食不洁等陋习和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各种畸形、病变。由此,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命质量为目的的卫生之事便成为强种强国的首要任务。因此,中国出现的首个体育概念便是在1897年由陈懋治等编写的小学教科书《蒙学读本》中,将体育定义为“卫生之事”,归属西方卫生学的知识门类。随后,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发表了“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25]9}及“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25]8}的言论;方万邦在1925年出版的教科书《体育》中指出,“体育是以身体大肌肉活动为工具的一种教育”^[26];1947年《辞海》编成,体育被明确界定为“辅助身体成长发达的训练”^[26]……最终促进了“国富民强”理念从社会意识向社会运动发展的转变历程。

萌生于殷商,制定于周公,弘扬于孔门的礼乐文化,在成为一种既定的国家体制后与统治阶层的政治

手段相辅相成,成为了维护尊卑长幼等级的秩序规范,其中,礼规范人的行为,乐教化人的心灵。礼乐文化在不断重复和巩固的程式化过程中,逐渐消解了最初的感性形式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进而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生命精神,并最终实现主体人格的社会化重塑。积学修身,便是礼乐文化由外在规范内化为君子人格的生命本体的必经之路,其价值在中国古代主要表现为文人儒生“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主要表现在有志之士“强国、和天下”的社会理想之中:如1980年胡晓风在《关于体育科学体系的若干问题》中认为“体育是一种寓教育于运动之中的社会现象,是通过运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丰富人们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27];1985年曹湘君在《体育概论》中提出广义的体育是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人的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的有意识、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包括狭义的体育(身体的教育)、竞技运动、身体锻炼和身体娱乐^[28];而2003年梁晓龙提出的“体育是人类通过专门设计的身体运动和游戏,达到增强体质、提高体育竞技水平和丰富社会生活目的的一种独特社会文化现象”^[29];以及2004年周西宽提出的体育是“人类以自身运动为主要手段改造自我身心的行为或过程”^[30]³⁵,“标志着人类对自己身体发展的审美理想”^[30]⁶⁵的论述,则在体育概念中更加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近年来,国内关于体育概念的界定更是层出不穷,有的将“身体的教育”树立为体育概念之正统,归属于教育的范畴之中^[31];有的将体育之“育”扩译为“培育”,使体育的概念更加宽泛具有包容性^[32];有的将由“体育”本义衍生的所有概念全部吸纳,以形成一个新时代的体育概念体系^[33];有的则采用国际社会共享通用的术语“Sport”作为总概念来指代所有类型的体育^[34]……结合中国古典哲学以及儒家“积学修身”的文化传统来看,无论古今,中国体育始终是一种以现实个体身心强健、社会群体和谐统一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对身体进行培育和教化的社会现象和文化活动,其实质就是一种礼乐教化活动以及人们将礼乐文化转化为自觉意识后所衍生的各类身体活动。

4 “雅俗共赏”的艺术精神与当代中国体育概念的逻辑思辨

概念,往往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一个事物的本质属

性,而具有形式逻辑思维的“属加种差”定义法可通过被定义项临近的属和种差把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知总结并巩固下来,常被学术界认为是最基本和最有效的概念界定方式。从术语的产生及演变的视角来看,“体育”与“德育”“智育”三者在日本兴学经验的影响下,于20世纪初期作为“日语借词”引进中文,并在严修、张謇、张之洞等人的推介下逐渐演变为国人熟悉的教育术语^[35]。至此,体育的概念从“教育的手段”到“身体的运动”再到“人类的社会活动”一路发展而来,可谓是愈发地完善和丰富,但其思维却一直没能脱离“属加种差”的逻辑定位模式。然而,传统“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却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只适用于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事物,而当面对不断变化、运动的事物时,这种定义法则显得苍白无力;同时,由于自然语言所指的事物一般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还容易形成多个可以由“属”加“种差”定义的义项。如体育的概念既是一种“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为目的的身体教育活动”,也是一种“以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主旨的休闲娱乐活动”,还有一种“以攀登运动技术高峰和创造优异运动成绩为目的的竞技运动活动”……概念作为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应具有确定性和唯一性,因此,为清晰体育的本质,就只能将其所属归于更大的类并进一步扩充种差的数量:如将体育的概念界定为“旨在强化体能的非生产性肢体活动”^[32]或“以满足健身、娱乐、情感等多元需求,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身体活动、情感活动与竞技比赛”^[34],但这些概念的界定方式却也存在着缺失上位概念或属概念的定义以及具有多种属性和种差等不符合逻辑规范的问题。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在理想语言哲学的影响下力图建立一套精确的语言系统来表述复杂的体育现象,在关于“体育本质”“体育概念”“体育属性”等体育语言问题的长期探索与争鸣中,却始终未形成令众人满意的观点和结论^[35]。但这并不意味着体育将无法定义,也不会妨碍人们对体育所进行的较为准确地把握,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有很多领域的边缘都是模糊的,它们都存在着各自的核心内涵和主要特征^[36]。基于此,为解决体育概念研究长期混乱的问题,应及时摆脱形式逻辑对体育概念的桎梏与异化,不能拘泥于传统形式逻辑的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应寻找一种更为宽广和深邃的视野来认识体育^[37]。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体育”术语的产生及其概念的演变在具

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呈现出了各不相同的侧重与内涵。但在中国,体育活动对传统礼乐文化的传承中孕育、发展而来,深受“美善统一”“健动不息”以及“天人合一”等古典哲学思想的熏陶,始终秉承着一种以完善人格修养为核心价值、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终目的的初心与原则,形成了一整套从敬护身体到舍生取义、从技能培养到术德并重、从“游于艺”到“成于乐”的审美价值体系。具体来看,中国儒家的美学观念以孔孟仁学、《易》《庸》哲学为思想基础,起源于人生的忧患,首先把握的是生命,其美学的特点在于能够结合人生的体验去把握历史与文化的真谛,从而揭示历史与文化背后的生命之美^[38];而老庄哲学更是强调由道德境界走向审美境界,并以审美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39]。由此,礼乐文化把原本是维系氏族社会的图腾歌舞和巫术礼仪逐渐内化为自觉人性和心理本体的建设^{[5]66},最终成为中国体育的本体与灵魂。

事实上,尽管“礼教”长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它还保留着某种外在理性的标准和痕迹,因此难以成为人生的最高实现;而“乐”作为一种审美的文化精神比“礼”更加注重从陶冶、熏陶、塑造人的心灵情感来维护人伦政教,它并非完全受制于“礼”、从属于“教”,而是常常在体现伦理教化意义之外还有着深厚的感性娱乐精神和广泛的世俗关怀。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这种世俗化潮流,使体育表现出一种原发性的民俗特征:其一方面体现在体育的主体由贵族阶级逐渐向平民化和大众化转移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体育秉承了传统礼乐文化的精神血脉而呈现出的以修身养性和世俗娱乐为主导的价值取向,从而实现了从礼乐教化向人生境界的华丽转向。因此,从功用的角度来看,体育不仅仅是一种对于技能、修养的培养教化,也是一种调养生息的健身手段;它既可以是一种“身在其中”的休闲娱乐,也可以是一种“和同观众”的观赏表演……中国体育在悠久的礼乐文化的传承中孕育发展而来,又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与交融中实现了文化与审美上的蜕变,建立起了一整套从身体教育到强种强国、从休闲娱乐到运动竞技、从观赏娱乐到塑形健身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话语体系。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过程中,中国体育无论从形式、内涵、观念乃至实践上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多方面的文化影响,并由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易和遮蔽。但若想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为中国体育在现代文化中寻找一片安身立命的沃土,就应

该首先从其赖以生成的传统礼乐文化视角出发,牢牢地把握体育以世俗和娱乐为核心的根本和命脉,将体育的本质直接地指向为一种“民间的”或“大众的”感性需求,才不会在时代的潮流中迷失自我。

5 结语

体育在文化生成的过程中,不仅体现为一种文化历史的沉淀,同时也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价值追求方式,在完善人的精神境界和全面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40]。在中国,体育深受传统礼乐文化和古典哲学的熏陶和影响而不断发展,既经受了古代数千年的王朝更迭与近代上百年来世事动荡,又不可避免地承受着以西方世界为参照的现代文化的冲击与审视,在某种意义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异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现象,从而走向了边缘化。特别是在 20 世纪以来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的现实条件下,中国传统体育若想在新的文化境遇中保持生命的活力,就应在积极吸收外来体育文化有益营养的同时,保持并凸显自己的艺术个性和礼乐本质,将礼乐文化的历史存在和精神传统视为我国体育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通过艺术自新的创新意识与文化自醒的批判精神立足当下,从而实现体育话语的古与今、中与外的涵摄与交流。

参考文献

- [1] 孙金亮. 体育起源论[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1981(01): 9-13.
- [2] 崔乐泉. 体育史[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 [3] 刘德佩. 关于体育起源与发展的社会学思考[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1998, 4(05): 31-38.
- [4] 崔乐泉.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源流[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1.
- [5] 李泽厚. 华夏美学[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
- [6]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 王弼, 注. 楼宇烈, 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27.
- [7] 庄周. 图解庄子[M]. 思履, 注.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 [8] 刘运好. 生命之美: 先秦审美观念的生成与演进[J]. 江海学刊, 2019(04): 197-206.
- [9] 礼记[M]. 陈澧, 注. 金晓东,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 [10] 施旭升. 中国戏曲审美文化论[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

- 出版社,2002:56.
- [11]方英敏.身体美:生命的象征——先秦身体审美本质论[J].贵州社会科学,2015(07):18-24.
- [1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13]张晓虎.意境、礼乐文化与身体审美[J].广西社会科学,2015(02):192-195.
- [14]荀况.荀子全译[M].蒋南华,罗书勤,杨寒清,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15.
- [15]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65.
- [16]朱丹溪.丹溪心法[M].田思胜,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10.
- [17]钟铨.颜元斋先生言行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61.
- [18]庞世伟,魏荣桥.论孔子的人格美育思想[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8(05):52-56.
- [19]李旭.中国美学主干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1.
- [20]董健.论礼乐精神的文化价值[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02):44-52.
- [21]汪民安.福柯的面孔[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315.
- [22]胡小明,黎文坛.论民族体育的审美价值[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10):1-4.
- [23]严复.严复全集(卷七)[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34.
- [24]凌红,李超.严复思想的伦理向度:“尚力”与“尚德”[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2(03):42-49.
- [25]毛泽东.体育之研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79.
- [26]韩丹.“体育”就是“身体教育”——谈“身体教育”术语和概念[J].体育与科学,2005,26(05):8-12.
- [27]胡晓风.关于体育科学体系的若干问题[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0(01):1-6.
- [28]曹湘君.体育概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5:29.
- [29]梁晓龙.体育和体育的功能与作用——当代中国体育若干基本理论问题探讨之一[J].体育文化导刊,2003(04):37-40.
- [30]周西宽.体育基本理论教程[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 [31]韩丹.谈体育概念的源流演变及其对我们的体育认识和改革的启示[J].体育与科学,2010(04):1-8.
- [32]张洪潭.体育概念研究进展[J].体育与科学,2011,32(03):11-19.
- [33]任海.当代体育发展与体育概念的界定[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9,45(05):4-7.
- [34]郝勤.体育史观的重构与研究范式的转变——兼论体育的源起与概念演进[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8,44(03):7-13.
- [35]李晓栋,李金龙.后现代主义与我国体育研究[J].体育科学,2015,35(11):89-96.
- [36]杨长荣.艺术导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2.
- [37]刘兴,马小华.形式逻辑对体育概念研究的异化[J].体育与科学,2013,34(04):86-89.
- [38]韩钟文,李丕显.儒家大美学观论纲[J].孔子研究,1995(02):23-32.
- [39]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3.
- [40]陶玉流.体育本体的文化哲学阐释[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6:1.

[责任编辑 江国平]